

他至今都记得：那天早上，一家人吃早饭，所有人都沉默，然后，爸爸带着包和妈妈走出门，我和弟弟就看着，说不出话。在某个拐弯的地方她就消失了，从来不回头。

歧途

事实上，乡村里有种“读书无用论”，蒋能杰将纪录片放给其他同龄人看，他们分析说，现在的孩子所接受的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可能还不如过去，至少那时大家懂得读书有用，他的话让蒋能杰后背发凉。

王会在调研中发现，农村家庭并非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，多数农村家庭都知道教育投资对家庭非常重要。但回报率低、高淘汰率和激烈的就业竞争，使教育投入风险被进一步放大。相比之下，外出打工似乎是更为实际的选择。

地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的不断分化，多数家庭都要精打细算以不至于被甩在后面。不少家庭甚至开始算计教育的机会成本和风险规避，虽然多数都有能力培养子女完成高等教育，但很多孩子成绩不好的父母更希望子女早点儿出来打工，中等家庭更不愿因为教育投资失败，而沦为村庄底层。

蒋恒是《村小的孩子》中唯一一个初中毕业辍学打工的孩子。由于经济条件限制，家里只能供养一个孩子读书，父母思量再三，把16岁的蒋恒送往衡阳亲戚的理发店当学徒。“干理发没有年龄限制，就学个技术呗。”对于辍学这个决定，蒋恒也很淡然，觉得“不上就不上了”。

打工六年，蒋恒换过三四个工作。2018年，当理发学徒。2020年，年龄到了18岁，开始进厂干包装盒流水线，不到一周，觉得辛苦，又干回理发。中间他还做过外卖员，因为工资太低，再次放弃。蒋恒曾对比了厨师、修车的工种，不是太脏，就是太累，理发是目前他认为还算轻松的工作。但他赚的工资不够花，有时还要父母补贴。

当记者问“你还想读书吗”，蒋恒说，先挣钱，挣钱了过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，读书也要先挣钱啊。“挣多少是多呢？”“七八千吧，现在工资四千多。”

农村学生读书以考上大学为目的，一旦这个预期被打破，读书就变得没意思。调查还发现，从2000年打工潮兴起，很多农村父母就开始鼓励读中学的子女早谈恋爱早结婚，这样可以



2022年春运期间，济南火车站，小朋友跟着祖辈返乡。

早日外出打工，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可以最大化，子代也可以及时回馈父代，以实现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。

时间一长，青少年，特别是留守青少年很容易走上歧途。《青苔不会消失》一书中分享了这一案例：高一辍学后的杨道德，很早外出打工了，认识了两个朋友，知道他们干拦路抢劫的勾当，却还是入了伙，第一天抢了四个人，得了4000块钱，然后一起去K歌喝酒。10天后他就被抓了，付出11年刑期的代价。

王会以苏北农村两乡镇中学田野调研为例，撰写了《农村学龄青年“混混”心态形成及其原因探析》。她指出，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，学校不良少年、留守少年、无业少年是一支向乡村江湖补充下层混混的庞大生力军。相当部分的农村留守儿童在乡村社会的持续转型当中，有发展成为乡村“混混”的可能性。

这一变化与乡村熟人社会断裂有很大关系。传统村庄作为熟人社会，人们在密集交往中产出社会资本，不仅通过互助合作解决个体急难之事，而且还生产出社会规范，提供矛盾纠纷化解机制。然而作为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村庄熟人社会，在市场力量的冲击下正逐步走向解体。

20世纪90年代前，吵架纠纷事件发生时，总有长者到场评理，游手好闲的农村小青年爱闹事打架，但普遍讲义气也讲道理。现在，村落社会变为不讲闲话、不讲道理的场域，打架时邻居都装作听不见，更没人愿意去“管闲事”。

乡村混混这一群体，已经在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、权力关系和道德秩序机制，使得一些农村进入了“灰色化”的社会状态。